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融资研究综述

李杜聪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要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制度性安排重塑了企业融资生态, 为根本上破解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关键支撑。文章系统梳理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企业融资的相关文献, 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通过信息共享、声誉构建、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经营风险四大核心机制, 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拓展了融资渠道并降低了融资成本。该效应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及信用环境薄弱地区更为显著。

关键词

社会信用体系, 企业融资, 融资约束, 信息不对称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Ducong 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Tianjin

Received: May 6, 2026; accepted: July 20,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As a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reshapes the corporate financing ecosystem thr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provides crucial support for fundamentally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difficult and costly financing for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rough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on corporate financing.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does not function through direct capital injection; instead, it effectively alleviates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expands financing channels, and reduces financing costs via four core mechanisms: information sharing, reputation building, improve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duced operational risks. Furthe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private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regions with underdeveloped credit environments.

Keywords

Social Credit System, Corporate Financ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强、融资成本高这一长期结构性矛盾，已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制度创新，致力于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长效机制，夯实市场经济的信任基础。在企业融资行为这一公司金融核心议题中，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善是引发融资约束的关键瓶颈。

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确立，以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与奖惩联动为核心机制，目标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率[1]。该体系包含四大功能互补的子系统，政务诚信子系统以政府信用建设为引领，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与跨部门数据共享，是整个体系的数据基础与公信力保障；商务诚信子系统聚焦市场主体经营、信贷、履约等各类商业行为，是直接作用于企业融资活动的核心板块；社会诚信子系统覆盖企业社会责任、公益事业缴费等领域的信用表现，补充完善企业多维度信用画像；司法公信子系统依托司法执行、商事裁决强化契约约束力，为信用奖惩机制提供法律层面的执行支撑[2]。四大子系统联动协同，共同构成企业融资活动的信用制度基础。

在实践推进路径上，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采用试点探索、分批推广的建设模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典型的准自然实验场景。自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相关主管部门先后分多批次选取不同地区开展信用建设试点，逐步形成可复制的经验模式并向全国推广[3]。试点政策的核心实施工具涵盖四个维度，市级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整合多维度企业信息形成统一可追溯的信用档案；跨部门联合奖惩机制对守信主体给予政策倾斜，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相应限制；信易贷等信用融资模式推动金融机构开发纯信用产品，降低企业融资对不动产抵押物的依赖[4]；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企业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降低守信主体的合规成本。由于试点政策在城市层面分批落地且选择具有外生性特征，现有研究普遍以此为准自然实验开展因果识别。

近年来，随着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的建设与信易贷等模式的机制化推进，信用信息共享水平显著提升，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实践背景。大量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信用城市试点等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表明，该体系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强化契约履行与提升治理效能，对企业融资行为产生了多维度影响，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关注的焦点。这些研究广泛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因果推断方法，证实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层作用。文章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体系作用主

¹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6/27/content_8913.htm

要通过信息共享、声誉构建、公司治理改善和经营风险降低四大核心机制实现，四大机制相互协同共同作用于企业融资各个环节。然而现有文献在不同融资渠道影响的研究上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梳理。因此，本综述的价值在于将分散的实证研究整合到统一分析框架下，系统阐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破解企业融资困境的核心路径。

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企业融资的核心机制

学界围绕社会信用体系影响企业融资的核心传导路径存在持续辩论，核心分歧在于制度的核心驱动力是信息透明还是声誉惩戒。整体来看，信息共享、声誉构建、治理优化与风险管控四大路径相互关联、彼此强化，其中信息效应与声誉效应对应两大核心研究脉络，治理效应与风险效应是两类路径共同延伸的作用维度，共同构成“信息为基础、声誉为激励、治理为约束、风险为保障”的分析框架，为改善企业融资状况提供系统性制度支撑。

2.1. 信息效应：缓解信息不对称

这一逻辑构成了信息透明主导论的核心依据。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信贷配给和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中，银行因无法精准识别企业质量倾向于采用信贷配给来应对风险，使大量优质企业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从而制约了企业发展[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的统一公共信用信息平台，通过整合工商登记、税务申报、司法执行等分散于多个部门的企业数据，可以形成系统化、可追溯的信用档案库，破解这一难题。这一实践构建了强大的信息共享机制，与国际研究中关于“信用信息共享能够缓解逆向选择、提升市场筛选效率”的结论高度契合[6]，显著增强了金融机构对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和信用质量的识别能力。在此基础上，“银税互动”等政策安排通过将企业纳税信用纳入银行授信体系，推动了信贷决策由依赖抵押物的“硬信息”转向兼顾企业经营能力、纳税表现等“软信息”，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信贷配给问题。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构建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网络，将企业分散的、潜在的信用资本转化为银行信贷决策中可评估、可验证的关键依据，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环境。该视角下的研究普遍认为，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构建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共享网络，将企业分散的、潜在的信用资本转化为银行信贷决策中可评估、可验证的关键依据，信息摩擦的降低是所有融资改善的根本前提。

2.2. 声誉效应：增强企业声誉资本

另一部分学者持声誉惩戒主导的观点，认为信息透明仅为制度运行的基础条件，真正重塑融资生态的是声誉激励约束机制。声誉资本是企业通过长期守信履约积累的无形资产，能够显著降低其未来融资成本，这一机制在债务市场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7]。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将分散的信用记录显性化与系统化，使无形的声誉得以转化为可验证、可交易的信用要素，为破解融资中的信任困境构建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信用良好的企业不仅能获得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条件，还能在商业信用关系中获取更有利的账期与付款方式，体现出声誉在融资定价中的直接作用[8]。随着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声誉资本进一步突破地域限制，企业可凭借良好的信用记录在跨区域融资中获得认可，显著降低异地经营中的搜寻与信任建立成本[9]。该视角下的研究更强调制度的激励约束属性，认为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将无形的声誉资本制度化、可交易化，构建了可持续的信誉评价与传导机制，在微观上重塑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条件，在宏观上优化了信用资本的配置效率。

2.3. 治理效应：优化公司治理与降低代理成本

治理优化是两类观点共同认可的延伸作用路径，但两派对其作用来源的解释存在差异：信息主导论

认为治理改善是信息透明带来的监督效应，声誉主导论则认为核心动力来自失信惩戒的约束作用。完善的法律与制度环境是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关键机制[10]。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外部治理制度，通过将企业的司法执行、行政处罚等行为纳入统一信用记录并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构建了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的联动体系，从而增强了对管理层的责任约束，为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管理决策与企业信用状况直接关联时，其不当行为将面临更高的声誉与融资成本，从而显著抑制了代理问题的发生[11]。同时，为维持良好的信用评级，企业主动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及时性，有效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增强投资者信心，进而降低权益融资成本[12]。整体而言，无论基于哪一派视角，社会信用体系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都能通过将信用约束嵌入公司决策流程增强内部治理有效性，从治理层面重塑企业融资能力。

2.4. 风险效应：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

经营风险降低是两类机制协同作用下的共识性结果，学界对此分歧较小，普遍认为信息与声誉机制共同通过多重路径提升企业经营稳定性。企业经营风险是影响其融资成本与现金流稳定性的关键因素[13]。在环境优化层面，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与违约概率[14]。完善的信用体系能够通过降低交易对手违约概率、提高合同履约效率，有效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在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的现金持有比例明显下降[15]。在司法保障层面，信用体系与司法执行的有效衔接提高了商事纠纷处理效率，降低了企业维权成本与合约执行风险，增强了交易可预期性[16]。在风险预警层面，基于信用信息共享的动态监测机制有助于企业及早期识别经营风险，提升其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17]。这使得企业能够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增强对潜在风险的抵御能力。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构建多层次的信用风险缓冲机制，有效提升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金融体系稳健服务实体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增强了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3. 社会信用体系对企业融资的多维影响

社会信用体系通过降低企业预防性动机直接缓解融资约束，依托信息共享与信用评价拓展多元融资渠道，并最终借助风险重估显著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从而系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1.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3.1.1. 预防性现金持有降低

企业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会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水平，而现金作为流动性最强但收益性较差的资产，其持有量直接反映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不确定性感知及代理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也通过提升企业信用和外部融资可获得性，减少了企业为预防性动机持有的现金，从企业流动性管理视角为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直接证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公共信用平台和守信约束制度，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优化企业投融资期限匹配，从而减少企业为应对不确定性而持有的预防性现金[18]。信用环境的改善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间接验证了预防性现金持有的降低是融资约束缓解的重要体现[19]。企业预防性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为社会信用体系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直接且有力的证据。

3.1.2. 信贷资源配置优化

信贷资源配置优化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缓解融资约束的核心体现。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整合分散的信用信息构建企业信用画像，显著提升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同时，其建立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

机制增强了企业信用意识，直接提升了融资可获得性。这些制度设计对传统金融体系中的“弱势群体”作用尤为显著，“银税互动”政策将小微企业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有效改善其信贷可及性。而政府背景大客户通过降低供应链违约风险，间接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20]。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弥补传统金融制度短板，有效发挥了制度补位功能。将信贷资源更公平地引导至因信息不对称而长期被忽视的优质民营和中小企业，从而优化了整体信贷资源配置的效率[21]。

3.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融资渠道的拓展作用

3.2.1. 拓展商业信用渠道

商业信用作为企业在贸易往来中产生的短期融资，是银行信贷的重要补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2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整合供应链上下游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交易伙伴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供应商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客户的付款能力与付款意愿[23]。同时，体系建立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增强了企业的声誉资本，提高了其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使信用良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更有利的账期与付款条件。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的地区，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周期明显缩短，坏账率显著下降，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得到优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仅扩大了商业信用融资的规模，还通过缩短账期、降低坏账率优化了商业信用的质量，从而提高了供应链上的资金周转效率。

3.2.2. 拓展银行信贷渠道

银行信贷作为企业融资的主渠道，其运行效率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获得了系统性提升。在量的方面，社会信用体系依托信用城市试点等政策，优化了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了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尤其在市场化程度低、金融发展水平弱的地区，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制度补充作用突出[24]，标志着信贷资源覆盖面的实质性扩大。在质的方面，社会信用体系驱动了信贷服务的内在优化，改善了信贷资源配置结构，“银税互动”政策通过社保缴费信息挖掘，助力企业获取长期资金，缓解期限错配风险，助力企业获取更多长期资金支持[25]。同时优化了信贷的主体结构，从而让优质民营企业获得更多支持[26]。在风险定价机制方面，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归集多维度信用信息，使银行能够构建更精准的风险评估模型，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实施更优惠的贷款利率[27]。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分散的信用信息转化为信贷决策依据，系统性提升了银行信贷服务的精准性与包容性。

3.3. 社会信用对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

3.3.1. 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债务融资成本是企业融资定价的核心指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降低银行信息搜集与风险评估成本，使金融机构能够以更优惠的利率向守信企业提供贷款。信用信息的透明化减少了贷前调查成本，动态风险监测降低了贷后管理成本，而失信惩戒机制则压缩了银行的预期损失，三者共同推动贷款利率下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完善的地区，企业的平均贷款利率显著低于其他地区[28]。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将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有效缓解小微企业信贷定价中的信息摩擦，进一步压降债务成本。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多层次信用机制的系统性构建，切实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

3.3.2. 降低权益融资成本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整合多维度信用信息，显著缓解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市场能够更精准地定价权益资本，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权益融资成本。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管理层自利行为，降低了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治理水平，进一步压降了权益资本成本。良好的

社会信用环境还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违约风险，为融资成本的降低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基础[29]。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强化公司治理和稳定经营预期，多维度地降低了权益融资成本[30]。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降低企业权益融资成本提供了多维度的证据支持。

3.4. 异质性分析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这种差异深刻揭示了政策效果在不同微观主体、中观行业与宏观区域间的复杂作用路径。准确把握企业特征、行业属性与地区环境等维度的差异化调节效应，是全面评估社会信用体系政策效能、推动其精准施策的关键前提。

3.4.1. 企业层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融资改善效应因企业微观特征的差异而呈现显著异质性，政策红利更多流向融资约束更严重的群体。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尤为突出，因其通过将纳税、社保等“软信息”转化为可验证的信用资本，有效缓解了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和信息不透明问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且对中小企业的边际改善更强。对于治理结构薄弱、代理问题突出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外部治理机制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降低代理成本[31]。从生命周期看，成长期企业因缺乏信用记录获益最大，而成熟期企业边际改善有限。此外，数字化水平高的企业能更高效对接信用平台，实现数据自动化传输，获得更显著的融资便利[32]。企业微观特征的异质性决定了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红利呈现出一种对制度短板的精准补偿效应，这深刻体现了该制度作为市场化补位机制的核心价值。

3.4.2. 行业层面

行业层面的异质性主要源于要素密集度、供应链特征和行业竞争程度等产业特性，这些中观因素显著影响社会信用体系政策效果的发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政策效应明显强于资本密集型行业[33]。供应链特征同样调节政策效果，对于处于长供应链中间环节的企业，其信用改善能通过提升链条透明度而产生更强的“链式反应”，这在汽车、电子等复杂供应链行业中尤为突出[34]。在垄断性较强的行业中，企业因竞争压力较小而缺乏提升信用的足够动力[35]。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其资源再配置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行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行业层面呈现出系统性的异质性特征。

3.4.3. 地区层面

地区层面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市场化进程、数字基础设施和金融生态等宏观环境因素上，这些条件共同调节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对法治薄弱等制度缺陷具有“替代效应”，通过非正式履约机制显著改善营商环境。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直接决定政策运行效率，在技术领先地区，信用平台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现更精准的风险评估和更高效的信审流程[36]。金融生态环境同样关键，在金融压抑严重地区，社会信用体系通过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边际效应更大。此外，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地区(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通过信用信息跨区域互认机制，显著降低了跨区域经营成本，形成政策效果的空间外溢[37]。可见，地区差异要求政策推进需与本地制度基础协同，以实现效率最大化。

4. 研究共识与未来展望

现有研究已在方法、理论与实证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需深化对多机制协同、长周期效应及技术融合路径的探讨，以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理论体系并释放其政策潜能。

4.1. 研究共识

现有文献通过系统性的实证探索，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影响企业融资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在方法论层面，学者们创新性地利用社会信用体系的分批推进特征，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等因果识别框架，有效克服了选择性偏差与内生性问题，为精准评估政策净效应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论支持。这一方法论创新不仅提升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更为评估类似制度变革的微观效应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范式。理论建构方面，研究突破了传统征信理论的单一维度，整合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等多学科视角，构建了信息-声誉-治理-风险四位一体的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不仅深化了制度经济学与公司金融的交叉研究，更为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解释工具。通过将信用制度嵌入更广阔的理论谱系，研究揭示了其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积累声誉资本、优化治理结构、缓释经营风险等多重路径协同作用的复杂机制。实践价值方面，系列研究证实社会信用体系通过重构银企信用生态，显著提升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其在缓解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方面展现出的普惠性特征，为破解结构性融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效果在信用环境薄弱地区的突出表现，体现了制度创新对市场失灵的矫正作用，为区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4.2. 未来展望

基于当前研究在理论框架与短期政策效果评估方面奠定的坚实基础，未来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的探索，可在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深化与拓展。在研究深度上，可着力探究“信息、声誉、治理、风险”等多重机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与协同效应，利用前沿计量方法解析其传导路径与相对贡献，从而精准识别政策作用的核心枢纽。在时间维度上，研究视野可进一步延伸至考察政策效果的长期动态演化轨迹，特别是分析其融资改善效应如何伴随企业不同成长阶段而演变，以及对各类企业融资结构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在研究视角上，在肯定其积极成效的同时，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全面、平衡的评估框架，审慎研判并优化政策实施细节，例如探索如何避免因惩戒机制设计不当可能引发的金融机构“过度风险规避”等非预期后果，实现惩戒、教育与发展的统一。在研究方法上，应积极推动研究与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动态信用画像、开发智能风控模型等新路径，丰富研究工具箱，为破解融资难题提供更精准、高效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 [1] 金轩.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 宏观经济管理, 2025(2): 7-8+17.
- [2] 黄卓, 陶云清, 王帅.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23(5): 96-114.
- [3] 钱雪松, 王帅, 秦睿祺. 信用信息共享降低了企业现金持有吗?——来自创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J]. 经济评论, 2024(4): 105-121.
- [4] 冯晨, 孙迎雪, 陶云清, 等. 以税增信、融资信息摩擦与企业投资结构[J]. 世界经济, 2025, 48(2): 138-165.
- [5] Stiglitz, J.E. and Weiss, A.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393-410.
- [6] Jappelli, T. and Pagano, M. (2002) Information Sharing, Lending and Defaults: Cross-Country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6, 2017-2045. [https://doi.org/10.1016/s0378-4266\(01\)00185-6](https://doi.org/10.1016/s0378-4266(01)00185-6)
- [7] Diamond, D.W. (1989) Reputation Acquisition in Debt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828-862. <https://doi.org/10.1086/261630>
- [8] 张欣琦, 杨胜刚, 王芍.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5, 22(2): 251-260.
- [9] 江成涛, 王亚雯, 王玉娟. 社会信用环境与资本跨区域流动——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政策和企业异地投

- 资的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6): 107-118.
- [10] Porta, R.L.,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and Vishny, R.W.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1113-1155. <https://doi.org/10.1086/250042>
- [11] 范润, 翟淑萍, 甦叶. 社会信用环境与企业违约风险——基于社会信用体系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经纬, 2024, 41(1): 120-133.
- [12] 钟娟, 丁怡帆, 魏彦杰. 得“信”者多助: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5, 45(9): 2872-2892.
- [13] Titman, S. and Wessels, R. (1988) 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3**, 1-19.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1988.tb02585.x>
- [14] 李彪, 霍治方. 社会失信环境与企业违约风险——来自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1(1): 80-95.
- [15] 邱金龙, 王雪, 张国珍. 地区失信环境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 45-57.
- [16] 张少辉, 陈建. 社会失信与企业“短贷长投”: 兼论失信信息公开制度的治理效应[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4, 44(9): 69-86.
- [17] 桂荷发, 刘泽源. 社会信用、现金持有与企业流动性管理[J]. 现代金融研究, 2025, 30(10): 72-86+99.
- [18] 郭红玉, 陈明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J]. 现代金融研究, 2024, 29(12): 13-23.
- [19] 张龙耀, 黄宇东, 李渊, 等. 信用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财经论丛, 2025(12): 89-99.
- [20] 窦超, 王乔苑, 陈晓. 政府背景客户关系能否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J]. 财经研究, 2020, 46(11): 49-63+168.
- [21] 游云天, 王建秀, 董媛香, 等.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信用修复及再修复的影响——基于社会信用体系试点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科学决策, 2025(2): 40-59.
- [22] 丁怡帆, 马云飞, 魏彦杰. 以“信”助“融”: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J]. 南方经济, 2025(4): 80-102.
- [23] 吴心涓, 范黎波.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效应研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5, 27(05): 3-19.
- [24] 于波, 王威.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统计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4): 149-154.
- [25] 黄永颖, 高岭, 汪圣国, 等. 中国社会保险缴费的信用激励效应: 来自“银税互动”的经验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5, 42(8): 199-220.
- [26] 郝颖, 孙雪冰. 社会信用环境、杠杆率分化与金融资源协调配置[J]. 江西社会科学, 2025, 45(1): 36-50+206-207.
- [27] 陈彦霖, 阳镇. 守信而立: 信用制度建设与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5, 47(9): 71-84.
- [28] 余楷文, 申宇, 赵绍阳. 大数据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来自数字社会信用平台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24, 59(3): 147-165.
- [29] 范润, 翟淑萍. 社会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8(5): 96-112.
- [30] 王巧玉, 孙舟天洋, 李佳. 社会信用与企业资本成本[J]. 投资研究, 2023, 42(3): 140-156.
- [31] 蒋殿春, 王倩倩. 社会信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机制与实证证据[J]. 产业经济研究, 2025(2): 98-113.
- [32] 谢婷婷, 李晓琴. 数字赋能下信用信息共享与企业 ESG 表现[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5, 40(8): 101-115.
- [33] 何欢浪, 耿若璇, 任岩. 城市信用水平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来自城市失信人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研究, 2023(5): 104-119+137.
- [34] 丁亚楠, 陈凯, 王璐.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供应商配置的影响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25(6): 54-66+127.
- [35] 沈国兵, 沈彬朝. 营商环境与企业中间品进口多元化: 来自中国的证据[J]. 社会科学, 2022(10): 133-147.
- [36] 江成涛, 殷江滨, 马瑞光.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赋能数字新质生产力——基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数量”“质量”同步提升的视角[J]. 商业研究, 2024(6): 100-112.
- [37] 周阔, 孙翊铭, 曲植.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区位选择——来自县域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南方经济, 2025(4): 58-79.